



縣委書記
任秀紅



山西師範大學副校長、哲學博士
衛建國



山西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劉敏慶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濤



縣人大常委會主任
韓建輝主持會議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中心主任
陳穎飛

荀子的民生思想 對安澤經濟社會的指導意義

安澤係荀子的故鄉，荀子是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荀子最在二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民富則國富、要重視民生、改善民生的觀念，並系統的闡述了這些觀念。發展成荀子民生思想。荀子的民生思想包含了民衆的生存條件、生活質量以及為保障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保障措施等內容。二千年以後，在荀子故里的安澤縣委、縣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一切從人民的最高利益出發，結合安澤現實情況，對荀子民生思想全面梳理和吸收的同時，並進行了一系列實際的惠民工作，有力的踐行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

荀子作為先秦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他不但重視民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為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國家應該採取的措施。荀子的民生思想包含了民衆的生存條件、生活質量以及為保障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政策、保障措施等內容。

荀子認為重視民生就要滿足民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必須先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然後才會「食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廉恥」。而民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外乎「食，欲有節；衣，欲有節；行，欲有節；又欲無餘財蓄積之富也」。其實這也是人之常情：吃東西，希望有美味佳餚；穿衣服，希望有繡着彩色花紋的綢緞；出行，希望有馬；又希望富裕得擁有綽綽有餘的財產積蓄；然而他們一年到頭，世世代代都知道財力不足，這就是人之常情。因而，國家要創造條件滿足民衆生存之需，順應民衆之常情，保證每一個人能夠體面、有尊嚴地生存下去，如是「為天下生民之慮民慮後」，則國家「而保萬世」。

作為荀子故里的安澤縣，在百姓的生存條件上大力改善。分兩步走，一個是城市建設，另一個是新農村建設。在城市建設上，實施沁河綜合治理工程、大油松綠化工程、沁河文化生態濕地公園、垃圾處理廠等10個城建精品工程；打造「一泓清水、兩岸錦繡」的亮麗景觀；即將開建的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集裝球場、游泳館、網球場、綜合訓練場於一體，填補了安澤歷史上無專業體育館的空白。在新農村建設中，以城鎮化、村集鎮經濟積聚、農村沼氣建設為重點，因地制宜地啟動了太陽能路燈、數字電視、衛生保潔、80歲以上老人生活補助、「五類貧困家庭學生」資助等「10個全覆蓋」工程，加快改善農村面貌和農民生活條件；成立了「基層黨建服務中心」，三級聯動、三網合一，整合了資源，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人民群眾，維護了社會穩定。這些條件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安澤縣人民的幸福指數，但這些條件的改善，只是政府對百姓外在生存條件的改變，光靠政府改善的生存條件民生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那麼如何才能解決民生的根本發展問題。

早在2000多年前的荀子提出了為解決民生問題而應該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和保障。荀子認為解決民生問題的關鍵在於發展經濟，通過發展經濟滿足民衆生存條件，讓民衆生活富裕，並提出了農業和商業並重發展的策略。

要改善民衆生活，就要重視農業的發展。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農業要發展經濟，尤其要重視農業的發展，認為根據不同的土地質量而進行合理耕種是農業發展的保障。農田被得到精心的合理耕作，那麼生產出來的穀物就會增長上百倍，民生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民衆即使遇到水災旱旱，也會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時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

安澤縣在這個方面作的比較典型，一個主題是「讓百姓富起來」。安澤縣大力發展優質玉米、有機蔬菜、優質核桃、畜禽養殖優勢主導產業，扶持農民創辦農業合作社，採用「公司＋合作社＋基地」的模式，發展訂單農業，增加農民生產收益，使傳統的「糧農」向「菜農」、「養殖大戶」轉變，「順糧田」向「萬元田」的轉變。通過一項項惠民工程，安澤人民的腰包鼓了起來，腰桿硬了起來，生活富裕起來。

荀子還認為除發展農業以外應發展商業貿易。荀子在《王制》中強調，政府要創造條件，通過發展商業，溝通四方，互通有無，使「財粟米，無有滯留」。有了商業貿易，就可以「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剝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致款粟」。民衆富裕了，國家就會穩固，社會就有了物質基礎，就會和諧發展。

安澤縣在發展商業貿易方面，一方面走市場經濟的道路，激勵商業貿易的發展；另一方面政府給予宏觀調整，努力構建多元發展新格局。安澤縣政府根據安澤地方特色，採取「走出去」的辦法，與山東壽光蔬菜產業集團合作，簽約蔬菜基地項目；同時新栽植優質核桃1.6萬畝；新建成高標準肉牛育肥示範小區2個；2萬頭育肥豬養殖場1座；千隻波爾山羊養殖場1座；高山綠茶、優質煙葉、桑園面積都有新的增長；全縣農業專業合作社累計發展到182個。這些工作的開展，直接促進了、刺激了安澤縣的商業貿易發展，使安澤縣民盡快脫貧致富。但這僅僅是第一步，還要注重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荀子民生思想中，不僅僅是對民生問題的解決，最重要的部分是能夠保障民衆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否則不能長治久安。針對這個問題，荀子提出了解決問題的關鍵環節，一是節用裕民，二是以政裕民。

荀子認為「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下不憂不足」。他認為政府只有做好開源、節流，對財物的收支時常加以調節，就可以使財物源源不斷地得到增加，老百姓才會生活富裕，國家才會安定和諧。相反「不知節用裕民實」。荀子系統論述了「節用裕民」的道理，通過「政」和「禮」兩條途徑，一方面節約開支，另一方面擴大財源，國家和人民才會逐漸富裕起來。

安澤縣作為作為一個有級貧困縣，收入少，只有一個錢袋子，節流不是辦法，那麼核心問題就要開源。安澤縣牢固樹立「項目是經濟之根、發展之本、財富之源」的理念，花大力氣，辦實業。「上大項目，培植財源」。把項目建設作為財源建設的載體和經濟發展的「引擎」，把重點項目建設作為推進超趕跨越的「總抓手」。通過「開源」戰略，安澤縣財政收入呈現出強勁增長態勢，「財政「蛋糕」越做越大。財政收入每年增長，全縣輦負，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安澤傳奇」。

以政裕民是用寬鬆的政策來解決民生問題。荀子認為政府應該創造優良政治環境，減輕人民負擔，減輕農、工商業賦稅，以政裕民。政治才會開明，生產才會發展，經濟才會繁榮，社會才會穩定。如果民衆生活苦勞作，到頭來卻享受不到任何成果，反而危及生存，那樣民衆就會暴亂。有了好的政治環境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實聚財，百工以巧盡器械」，各職業人民按其基本分而盡其長其力而盡。這樣的社會就會和諧，和諧社會時「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這種情況就叫做政治，所以有人才富有天下，也不認為自己擁有的多；有的人看管城門、招待旅客、守衛關卡、巡邏打更，也不認為自己所得的少。正孟子所說：「民憂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國家如果能夠保障民衆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生產秩序，使人們和睦相處，解決出政通人和的盛世景象，否則「萬物失宜，事變應生，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燬若焦」。

從荀子的民生思想中可以看出，荀子是一位現實主義者，他主張用實力來解決民生問題，不但看到了民生問題，而且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途徑，不但認識到了民衆在社會歷史變革中的巨大力量，而且認為國家只有改善民生，制定促進發展農業生產、繁榮經濟的措施，讓人民過上安穩富裕的生活，社會才能實現長久安定的目標。

荀子的民生思想不是被動地等待政府去解決，而是主動積極地從各個方面去考慮，先是解決民衆的生存條件，然後是發展農業和商業，最後政府在政治環境上給予保障可持續發展，達到「同富民富」的政治理想。他所提出的一套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和措施，對我們現在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發作用與借鑒意義。弘揚荀子文化，不僅有利和諧安澤，甚至對建設和諧中國都有着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安澤的荀子，也是中華

十月的安澤紅葉盡染，十月的安澤碩果飄香。第六屆中國（山西·安澤）荀子文化節高層論壇開幕，來自省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齊聚荀子故里——安澤，著述論荀子，暢談說發展，把荀子思想和安澤的轉型跨越發展很好的結合起來，為安澤的發展出謀劃策。北大著名教授孔慶東作了「荀子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專題報告會，如其所言：荀子思想強調創新，強調人的主觀能动性，安澤作為荀子故里，要進一步以荀子為媒，借荀子文化節這個平台，「輸出」荀子思想文化；要弘揚傳統文化，繼承其思想精髓，把荀子文化思想用好用活、做大做强荀子文化產業，不斷提升縣域文化軟實力，促進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文：遼 霞 孟晉鶴 牛國根 攝影：蘇曉峰



山西省臨汾市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喬忠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
張覺

荀子、世界的荀子。

在此方面安澤縣創造優良的政治環境，總結為六句話：做決策想問題，民本民生第一。把「民本為先，民生至上」的施政理念深深溶入各項決策中，更加自覺地關注民生、貼近民心、促進民和。

抓發展搞經濟，民艱民利是目的。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科學的發展觀，急群眾所急，帶著感情接訪，换位思考辦訪，真正把上訪群眾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竭盡全力贏民心，務實高效解難題，更好地維護民心順、政局穩、事業興的良好局面。

解矛盾提高效率，居民民氣早平息。群衆利益無小事，要想群衆所想，急群衆所急，帶著感情接訪，换位思考辦訪，真正把上訪群眾當作自己的親人看待，竭盡全力贏民心，務實高效解難題，更好地維護民心順、政局穩、事業興的良好局面。

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

《荀子》一書中所蘊含的社會管理思想十分豐富，如：王霸兼用的社會管理目標、隆禮重法的社會管理手段、明分使群的社會組織制度、尚賢使能的社會用人思想等。

王霸兼用的社會管理目標。我國自古就有「以德服人」和「以力服人」兩種不同的社會管理理念。這種理念上的差別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就是「王霸之辯」。王霸之辯是先秦百家關於治國方略爭論最多的一個話題。王道主要是指通過實行仁政，以德治為主要手段，達到「王天下」的目的。霸道主要是指通過實行法治，用強制的手段，通過武力征服，達到「霸天下」。

在王霸問題上，荀子繼承了儒家自孔子以來崇王黜霸的思想，他在《仲尼篇》說：「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慕文禮也，非服人之也也」。他批評非本政教，未隆高禮義，不重視修習禮義，依仗暴力權謀而不是依靠仁義爭取民心。荀子雖然崇王黜霸，但不是完全否定霸道，在《王霸》中，荀子說：「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王」，此所謂義立而王，是指王道依義仁義而立，信立而霸指倚仗兵、言文公等霸主能信信用；權謀立而王，是指那些根本不講信義用背棄權謀欺詐之諸侯。荀子將信立與權謀相區別，是對齊桓公等霸主的肯定，說明霸道並非權謀權權。

荀子還將王道主張貫徹到用兵思想，認為軍事上的勝敗在於士氣，而士氣之高低由於民心向背。荀子曾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談兵，在《荀子·議兵篇》載：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義理。荀子認為用兵之根本在於爭取民心，而兵要在于善附民而已。荀子和弟子陳轅、李斯曾有問答：「故近者親其君，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鄰」，兵不血刃就可以使遠近來服，這完全是以仁義盛德影響及於邊遠。荀子還對李斯所炫耀的「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的說法，指出秦雖有民生，基礎強盛，但它無仁義王道為精神支柱，而招致列國諸侯之聯合反對，而引起起恐慌，這種表現不過是沒有統統的未之兵而已。荀子認為荀子仁義並非一日之功，而是前行素履，即長期堅定不移地貫徹仁義的結果。

荀子有王霸兼用觀，他注意實力在諸侯競爭中的現實意義，注重耕戰和賞罰等法制措施和手段，主張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能實現王道，而實現霸道亦順理成章。荀子的這些社會管理思想對漢初「霸王道雜之」即王霸兼用有重要影響。



縣長
鄧步電



山西大學教授
馮良珍



山西師範大學教授、荀子學院院長
張有智



三晉文化研究會理事
李尚師



山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
張煥君



山西師範大學荀子學院副院長
暢海樺

顧疏，不顧貴賤，要與官能相稱。其四，校之以禮，在考核人才是要用「禮」作為標準。

荀子的禮法並重論，有利於全國性封建中央集權的建立，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對後世地主階級改革家具有啓蒙作用。荀子思想中探索社會管理的規律性問題的內容，帶有濃烈的實踐色彩，對後世影響很大。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反對封建迷信，包含着樸素的唯物主義。其天道自然觀和主張尊重客觀事物、知行合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對中國哲學的唯物主義傳統起承上啟下作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文明建設要求切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早在兩千多年前荀子的社會管理思想就從各個方面分析了社會和人的管理，雖然其思想具有歷史局限性和階級性，但它對於推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

荀學的治國思想

荀子是我國偉大的治國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而是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從帝堯時期的皋陶「明刑弼教」思想，到春秋戰國之交的卜子夏「儒法兼治」思想，再到戰國末期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才是我國五千年來的治國思想主線。歷史證明了統治不能治國，純儒亦不能治國，只有以「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為核心的「荀學」才是我國二千多年來帝王治國的主要學說，而且「荀學」對當今社會也有一定可借鑒的現實意義。

荀子生活在戰國末期，封建制度已經確立，諸子百家、各派各家之間出現了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局面。其時正值七雄並峙局面即將結束，封建的大一統即將形成的時期。當時，齊國的統治者為了擴大政治影響，招納知識分子，聘請了許多著名學者到稷下學宮講學。當時名士像孟軻、鄒衍、宋鈞、魯仲連等都曾活躍於稷下。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學術活動中心，荀子到了齊國稷下講學，因其知識淵博，所以「最為老師」，「三為祭酒」（《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當時齊國兵強勢盛，他企圖說服齊國君臣實行儒法兼用的治國方略，爭取統一天下。他說：「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以勝人之道，行勝人之道，天下莫能，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勢，不以為勝人之道，索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荀子·強國）又勸說齊國齊相田文選賢任能，「如是，……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人民莫不願以齊為霸，是一天下也」。但當時的齊魯王居功自傲，聽不進荀子的建議。荀子向齊國君臣提出警告說：「今巨楚縣吾南，大燕獻其後，勁魏與吾右。」（同上）齊國如果不實行「隆禮重法」，三國將被幾瓜分齊國，然而他的警告未被採納，只好離開齊去秦，後來齊國果然被燕國打敗，齊魯王在逃亡途中被殺。

末幾，他到秦國會見了秦昭王和宰相范雎，陳述了自己意見，把統一全國的希望寄託於秦，然而他在秦國難以推行自己的學說，便去了楚國。楚國楚昭王便任命他為蘭陵令，不久春申君聽了讒言便辭謝了他。他又離楚去了趙國，趙以為他上卿（見《戰國策·楚策》），他在與臨武君和趙孝成王談兵時，闡述了他的用兵主張，然而他的這一主張，並未真正被趙國接受，反而遭到排擠。這時，楚國又有有人勸說春申君留荀子，於是，春申君便派人又把荀子請回趙國，做了蘭陵令。再後來，春申君被殺，他無事可幹，便定居蘭陵，發憤著書。他經過在齊魯下學宮與他學說的交鋒和碰撞及對秦、趙、楚等國統治者的游說，使其治國學說日臻完善，於是，便使出了傳於後世的《荀子》三十二篇巨著（僅少數篇章為其弟子所補充）。其內容非常豐富，涉及哲學思想、政治主張、治學方法、立身處世之道、學術論辯等。在治國思想方面，他繼承了皋陶的「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卜子夏的「儒法兼治」治國思想，在《解蔽》中批判了各家的片面性，用「非十二子」摒棄了各家之短，批判了儒家、墨家、儒家、法家、名家的思想，魏牟、陳仲、史猷、墨翟、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鄒衍、子思、孟軻十二子。批判地吸收了當時諸子各家學說所長，從而形成了它的治國學說——「判

學」。荀子的學說體系達到了先秦治國哲學的最高峰，他自然成為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既是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那麼荀學當然地包括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名家等。它其中主要是儒家和法家，即荀學的治國思想核心是「隆禮」「重法」。「隆禮」更是第一位，也就是說，儒家學說是荀學說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重法」亦是荀學中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說內容是由李悝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三部分組成，其中李悝的法治是最主要的。荀子是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學如法家一樣只是荀學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已。宇宙未遠處在矛盾之中，自然界有天地；天空有日月；大道分陰陽；位置分上下、左右、前後；人分男女，治國學說也一樣，主要是由儒法兩家學說組成的，猶如人有兩隻手，鳥有兩隻翅膀，儒學也像法家一樣，只是荀學中的一隻手或一隻翅膀而已。

「儒學」的核心是「仁」，講的是忠君（統治者）、愛人（父母、兄弟、姐妹、親朋及他人），優點是，以「義」為重，教人為善，它可以各種化解矛盾，使社會和諧，有利於社會安定，有利於君主統治。就治國而言，可謂之陰柔統治之術。缺點是使人缺乏進取、競爭精神，使社會發展緩慢，對外軟弱。「重法」是從人的「好利惡害」自然本性出發，主張一切惟法是依，以「利」為重，尚戰、尚刑、尚利，能激發人的上進拼搏精神，具有陽剛之氣，使社會快速發展，對外稱強不屈。缺點是：容易激化矛盾，國家不易安定，容易引發社會動亂。總之，儒法兩家各有利弊，卻互為補充，只有將儒法兩家學說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是治國的正確思想。所以，荀子的「隆禮重法」學說，是我國封建社會盛世治國的行之有效的唯一正確學說。

梁啟超、譚嗣同在《仁學》中說：「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此話講得很有道理，很符合中國的歷史發展真實情況。「秦政」是指秦始皇遵照荀子的學生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的理論，在荀子的另一個學生秦國宰相法家李斯的幫助下，實行的封建君主專政中央集權制。中國自秦朝至今，無一個朝代不實行中央集權制。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治國歷史中，遵照了舉國、卜子夏、荀子這一禮法（或稱儒法、或稱王霸並重霸道）並用的思想主線去做，使會國治民安，偏離了他，則會動亂亡國。縱觀我國歷史，自秦朝統一至清朝的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秦始皇純用「法治」治國，僅十五年便在農民起義風暴中滅亡。王莽新朝純用「王道」（儒學）治國，也僅十三年便被劉秀推翻。宋明兩朝，後期儒學盛行（程顥、程頤二程的理學盛行），所以雖然經濟發達，卻不能統一中國，只能先興後、西夏勉強三足鼎立，而且對外交戰吃敗仗，其結果總是為苟安而賠款尋國。後來北宋末年更被金人打得落花流水，徽、欽二帝被俘，南宋儒學更是盛行（朱熹將二程的理學發展得成為完整的理學體系），結果只能是苟延殘喘，龜縮東南一隅。而採用「隆禮」（重法）並用的朝代，無不國治民安，稱霸於天下，例如漢武帝治國，雖名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儒術」，實際是採「荀學」錯認歸為「儒術」的錯誤叫法，其實「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法）王（儒）道而雜之」，漢宣帝即位後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更不廢平治治道矣」，他嚴格推行法治，嚴格賞罰制度，整頓吏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治其職，民安其業」。於是，漢朝再度興旺，史家評論漢宣帝為「功光祖業，業重後嗣，可謂中興」的「孝宣之治」；唐太宗以及清朝康熙、乾隆無不如此。漢唐盛景，清代乾、乾時期皆是因為了遵循荀子「隆禮重法」這一治國思想的結果。

改革開放後，我國先是提出了「依法治國」，後來中央又提出了「以德治國」，這「依法治國」、「以德治國」並用的治國方略，與兩千多年荀子的「隆禮」與「重法」並重治國思想，又是何等地相似！我們研究「荀學」，不僅對國家執政者有可借鑒之處，而且對於一個部門、一個地區、一個單位、一個學校，乃至一個家庭，都有着可借鑒之現實意義。